

陈翰笙同志谈《地下工作二十五年》

陈洪进笔记

1925—1950

[为了响应社科院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组 1984 年 1 月 7 日的通知，从 3 月 6 日起开始口述参加党和革命的经历。共计经过 31 次，10 月 8 日口述完毕，11 月 17 日定稿，11 月 19 日复核了全稿]

我于 1915 年去美国留学，第一年进预备学校，第二年考进了波莫纳大学。在二年级的时候，听到俄国圣彼得堡发生革命，为了想多知道些革命的历史，我在大学毕业前读了德文和俄文，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从 1922 年到 1924 年，在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在奥托·赫契教授那里读了一些俄国革命史，但还没有想到中国怎样才能发动革命。在柏林大学得了博士学位，并在那里遇见了蔡元培，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教授。

在 1924 年 4 月到北京大学教外国历史时，我遇到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从他那里了解到苏联的情况，听从他的劝告，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常常同我讨论社会史的一些问题。我们讨论得很认真，兴趣十分浓厚，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到深夜，太迟了我就在他那里住宿。他的谈话使我认识到：社会是必然会进步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进步总是非常缓慢的，人民的苦难会拖延很久。

格里涅维奇介绍我认识当时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从他那里我看到了苏联的一些报纸杂志，因此，我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些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也有所提高。

1924年春，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忙于建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我进北大不久就和他相识了。我的多年好友高仁山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约我同他一起去寻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和北大讲师于树德作介绍人让高仁山和我参加他们刚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

当时，国民党左派胡汉民出了5000元给北大教授王世杰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周刊。我和北大英美派教授们熟识，是《现代评论》的编辑之一。大钊同志劝我要和他们在一起，还要继续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文章，不可疏远他们。

1925—1927年

1925年发生的上海五卅惨案，燃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烈火，加深了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大钊同志派我以《现代评论》杂志编辑的身份去上海，动员英租界印度巡捕罢工。我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见到了李立三和陈云两同志。我们预计，要发动巡捕罢工，救济费至少要筹足70万元。可是把各方面的钱数合计在一起，总共还不到一半，距离我们的目标很远。因此，计划没有能够实现，无可奈何，只好离沪返京。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大钊同志和我同时在场。军警向群众开枪，大钊同志头部和双手受伤，群众背着他走出东直门。事后，他要我写篇文章记述这个事件，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我写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发表于《现代评论》第68期（3月27日出版）。

“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大钊同志介绍我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见面谈话。加拉罕大使劝我为共产国际工作，我立即答应，从

此，我每月用英文写文章交给大钊同志，由他交给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由他送交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

这时候，大钊同志介绍我妻顾淑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在苏联呆了一年（1926年）。

1926年初，有一天夜晚，地下党员胡鄂公突然来找我。他说蔡和森同志这时正在北京，住在城外一个很远的地方，想找我谈谈，要他来领我去他住处。去后，和森同志和我谈了一夜，谈完时，天已大亮。胡鄂公在另一房间里还熟睡未醒，把他叫醒后，仍由他送我进城。和森同志与我那一夜的谈话，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很大影响。他谈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问题。他说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非常重要。他劝我认真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的问题，要着重研究历史和现状。从此，我十分注意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我国的农村经济。

1927年1月，国民政府在武汉掌握政权，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电邀周鲠生、王世杰和我三人去汉口参加工作。2月间，我们三人同到汉口，被委任为外交部顾问。2月底，大钊同志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立即离汉返京。我托辞父病，去沪侍疾，回到北京。

大钊同志是在1927年4月6日被捕的。在他被捕的前两天，我在东交民巷还同他见面。他同过去一样，一再叮嘱我不要暴露自己的革命身份，要用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活动。他的话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理解他的意思：我担任的工作是共产国际的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是秘密工作，所以必须同时要有公开的职业。

我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时候，我妻顾淑型同志在北京艺文中学当教务主任。我们俩最接近的人，一个是多年好友高仁山，另外两个是北大进步学生，一个是湖南女生张挹兰，一个是历史系的男生无锡人王寅生。王寅生不但是同乡还是远亲，很爱好学习，常常来往。

高仁山是我 1920 年下半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认识的。高是江苏江阴人，家住天津，在南开读中学，在日本勤工俭学时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创立新中学会。他在美国时曾发起新中学会美国分会。他立志教育救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育系副主任，同时创办艺文中学，实行道尔顿制的教学法，聘任顾淑型教课兼教务主任。艺文中学是个进步学校，教员和学生中有地下党员，前中共北京市委的刘仁同志就是在此校毕业的，校址先在北河沿，后在灯市口，就是现在的第 28 中。高那次同我一起看了大钊同志后，就帮助大钊同志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工作。高一直不知道我和大钊同志的关系以及我所担任的工作。

那时，北京大学有两派在明争暗斗。英美派的头头是胡适，日法派的头头是国民党西山会议的李石曾和历史系主任朱希祖。朱希祖想排挤我，捏造一份由学生具名给北大评议会对我进行攻击的指责信。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对高仁山讲了这件事。我告诉了大钊同志。他指出这是国民党右派李石曾的阴谋。他还说，切不可上当去追查真相；真相大白，反会把事情闹僵，应当找法学院的周鲠生教授想办法。我照他的话办了。周鲠生聘我在法学院教美国宪法史。结果，我在历史系继续教欧美通史和史学史。李石曾和朱希祖想排挤我的阴谋没有得逞。

大钊同志的被害，告密人是李石曾。“五卅”反帝运动后，北方军阀土崩瓦解，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倾向革命。大钊同志派人到国民军中工作，反对直奉军阀。在军阀白色恐怖时，大钊同志转入地下，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面的中东铁路办事处工作。一般人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李石曾得到了消息，向奉系军阀张作霖告密，并且献策取得公使团代理首席使节荷兰公使的同意，让武装军警进入东交民巷逮捕了大钊同志。

高仁山和张挹兰也先后被捕。李石曾趾高气扬。奉系军阀派人统治北大，学校一片混乱。我无法任教，随时有被株连的可能。

显然，原来的住处不能呆了。必须立即离开，我和顾淑型搬

到小牌坊胡同里一个偏僻的胡同里暂住。王寅生说，他认识一个日本朋友，名叫铃江言一，可能帮我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铃江言一我早认识，他表现进步，同情中国，认识不少中共党员。铃江介绍我认识另一个日本人名叫中江丑吉。这人的职业是替北京《顺天时报》写社论。当时曹汝霖有不少房产，他为联络日本人，分出一些房屋给中江丑吉住。铃江就安排我住在中江那里。我在他那里住了几天。最后决定先到日本，再从那里去苏联，实现我的理想。中江送我和顾淑型到火车站去天津，再从天津去日本，当时去日本是不要护照的。

到了天津，我们改名换姓，住进了一个小客栈里，说是去上海的。第二天到神户。到苏联去必须领护照。幸好，驻神户的中国领事是顾淑型的一个亲戚。他替我们办了护照。我们乘船到敦贺（Tsuruga），又搭上日本的小客船到海参崴。从那里乘火车到莫斯科。

1927—1928 年

一到莫斯科，我们就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所长伏斯涅钦斯基。原来，我们在北京时就预先联系好了。当时，北京塔斯社主任明欣常来找我解答他不了解的问题，他夫妇俩与我们都很熟识。他知道我要去苏联研究农民问题，就建议我去找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主任伏斯涅钦斯基。大概在我走时，他就去了电报，所以，一见面伏斯涅钦斯基就知道我的来意。他是立陶宛人，体格魁梧，声音洪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我参加研究所的工作，立即把我介绍给所里的会计员阿利卢耶娃，说我的生活费就向她领。然后又把我介绍给所里的研究员马季亚尔，说“他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你们可以在一起工作”。

当时，莫斯科住房相当紧张，所以这位所长又帮助我们找住处。他介绍我们认识布哈林的父亲，见过几次面，谈过几次话。他

也没有给我们找到住处，幸好后来我们找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才找到了住处。她在莫斯科近郊有一间空房，是他们夏天休息的地方。房间门窗齐全，其它一无所有，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地板。我们买了些乾草铺在地上当卧铺。每天一早乘半小时的有轨电车去莫斯科，白天在那里工作，吃饭，晚上回到住处过夜。当时供应相当紧张，日用品短缺，纸张奇缺，没有手纸，只能用报纸代替，皮肤和内衣经常沾上油墨。

会计员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夫人，腰宽体胖，和蔼可亲，自从相识以后，见面总是满面笑容。每逢向她领工资，她总是拉住我亲切地问候顾淑型同志，问长问短，她的热情令人难忘。

研究员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他同我讨论过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他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理由是中国在北宋时期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说，那时期流通全国的商品，主要只有茶叶和蚕丝，那不过是商业资本，只能说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辩论过好几次，都是各不相让。

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情况与欧美的学术研究机关，情况大不相同。欧美研究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有专门知识的学者，而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而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欢喜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有一次，一个 20 来岁的青年同我辩论，到了理屈词穷的时候，竟然断定我没有读过马列主义著作，意气用事地说：“你读过《资本论》没有？你们中国人是不懂得中国历史的。”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作风很不踏实，也

没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呆了一年，到了 1928 年夏天，我和顾淑型同志就急于想回国了。

1927 年 12 月间，我在莫斯科经宋庆龄介绍认识了邓演达。他是在九月间国民党宁汉沪三方面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后来莫斯科的。

有一天听说陈友仁和宋庆龄也来到莫斯科，都住在红场附近的饭店里。那里是苏联的国宾馆。陈友仁是 1925 年夏天在北京认识的。他为了想在北京办一家英文日报，来找我商量办法。可是，不久广州打电报给他要他南下工作，办报的计划作罢了。1927 年初在武汉又有过来往，所以很想看看他。他介绍我认识了宋庆龄。宋庆龄同陈友仁讲话用英语，同我用上海话。下午她招待我们喝茶，谈了一些时事。宋庆龄诚恳纯朴，没有教条八股的词藻，流露着革命热情，令人感到亲切。因此，1928 年夏天我和顾淑型回到上海时，又去看她，她住在莫里哀路，房子是位华侨送的。

1928—1933 年

我回到上海，没有人知道我是从苏联回来的，只以为是从日本回国的。尽管如此，过去在一起编《现代评论》的国民党右派前北大教授王世杰总疑心我是中共党员。当时他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院长蔡元培，建议要我当副所长，王世杰婉言拒绝。蔡先生就介绍我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那里去整理《中国百科全书》的书稿。

幸好，次年（1929 年）王世杰被调往南京任法制局局长。蔡元培就去同王云五商量，并得到他的同意，让我在一年合同期满前去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自己兼任所长。

回想到我在莫斯科同马季亚尔等人辩论时所引起的对教条主义的反感，我就想乘在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机会来调查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到研究所，我就聘请北大历史系的学生王寅生

为助理研究员。起初，我们在上海对日本人办的棉纺包身工制度进行调查，那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反动派对我们的注意。我们提高了警惕，立即转变方向，多做农村经济调查，以避免社会调查夭折的危险。随后，我就同王寅生、张锡昌、张稼夫、石凯福（现名石樵）、钱俊瑞、秦柳方等同志到无锡、保定、潍县、江苏的蒙台子等地进行农村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证明：地主阶级、军阀官僚、高利贷者和外国商人的剥削，造成我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的破产阻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除实行土地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在上海的时候，由于王寅生的介绍，我认识了潘梓年，谈过几次话。也在那时候，托派彭述之不止一次到我家来同我谈话，他认为斯大林对待托洛茨基是不民主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劝我不要迷信共产党。他的用意显然想拉我参加他们那一派。

那时，邓演达住在西摩路（今陕西路），曾来看过我几次，主要是谈教育改革问题。有两次是和章伯钧一起来的。我们谈得很融洽。

我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全所经费是很有限的。我们尽量把经费用在农村经济调查方面。因此，我们计划进行的剪报工作，经费就没有着落。但是，要了解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剪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碰巧，我有一次同当时铁道部长顾孟余谈话，从铁道部弄到一笔钱，剪报工作才能进行。顾孟余是在德国学经济的留学生，在北大曾同事两年，比较熟识。他问我月薪多少钱，我说大洋400元。他还问我够用不够用。我说，我们夫妇都有工作，又没有孩子，当然够用。不过，社会科学研究所打算订阅期刊报纸，却缺少这笔经费。顾马上说：“你就算是铁道部的顾问，月薪400元，够不够？”这样，我们就请了李沧江和曹轶欧担任剪报工作。那时，曹轶欧和康生都在上海大学。李沧江是江苏省宜兴县人，后来参加洪湖赤卫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了。

有一次，我到莫里哀路去看宋庆龄，遇见美国人史沫特莱女士。她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驻华记者。她告诉我她住在霞飞坊，要我到她那里去谈谈。彼此熟识以后，就常在一起讨论革命理论和时事问题。她常把她写的通讯稿拿给我看，要我提供意见。她从我处了解到当时蒋政权的内部矛盾和反共媚外的情况。因为，我当时常常见到国民党官员如陈公博、顾孟余、唐友壬、朱家骅、段锡朋、何思源之类的人物，所以能够了解统治集团的内幕。可是，史沫特莱当年就被《法兰克福日报》社解雇了。后来听说，这是政学系丁文江和胡适破坏的结果，他们请求德国驻沪领事要该报社停止她的工作。

当时，第三国际太平洋劳工组织在上海办了一个英文周刊，叫做《上海新闻》，我和史沫特莱常用笔名在这个周刊上发表文章。史沫特莱常到宋庆龄那里去，也常和鲁迅谈话。我和鲁迅见面谈话是宋庆龄介绍的。见面时我说，我就是他在《语丝》上提到的“吾家世兄”。他听到了，哈哈大笑。由于我和邓演达谈得来，邓又在宋庆龄面前常提到我，所以，宋庆龄、蔡元培和杨杏佛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的时候，有时要我护送难友脱险或送交信件。1931年6月15日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劳动会议干事牛兰夫妇在上海租界被捕。第三国际请了一位瑞士律师来上海为牛兰夫妇辩护。我曾几次把宋庆龄的信件送交那位律师。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一人送信，另一人远远在后随行，准备一人遇险，随行者可以了解情况。记得有一次，我去《申报》馆送交民权保障同盟的信件，随行人是谢树英。他是德国留学回来的，现在在北京钢铁学院当教授。

杨杏佛是邓演达的好朋友。我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些出版物和几次实地调查，多亏总干事杨杏佛的努力才能实现，否则是不可能的。有一次，我从宋庆龄那里出去，五分钟后，杨杏佛去看她，问她刚才是谁来的。宋就没有告诉他是我在那里。邓演达被捕后，蔡元培用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写信给陈诚进行营救。蔡元培要我办这件事，我找了彭学沛带我去见了陈诚。

当我在上海的时候，史沫特莱曾经提出要同我结婚，我告诉她我已经结婚。过了两个月，她告诉我她已经和左尔格结婚，要我认识左尔格。一个星期后，有一天早晨我去看史沫特莱，看见左尔格也在那里，知道他们已经住在一起。后来我知道左尔格是苏联杰出的情报工作者。我还因史沫特莱认识了在上海满铁研究所工作的尾崎秀实，他是和左尔格一起工作的。有一次，我跟左尔格提到了孙冶方。左尔格愿意见他。我约了孙冶方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见面。可是，出乎意料，孙见到左尔格时用俄语问好。左尔格装作不懂，赶快告辞了，对我说以后也不见他。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孙冶方。左尔格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精通德语、俄语、英语。他用美国记者名义在上海收集情报，并伪装成纳粹分子结识了上海的德国领事和南京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部的人物，他在上海从白俄总部倾听白俄流亡者的谈话，左尔格在上海只讲英语，不能暴露他懂俄语，也不让人家知道他认识我。我和左尔格联系是通过尾崎秀实。

1932年1月左尔格通过尾崎秀实给我一封信，要我陪他到西安去一趟。约定在某天某时手提打字机在徐州火车站候车室等他一同乘火车去西安。我们到了西安，找了南汉宸（陕西省长杨虎城的秘书），第二天南汉宸招待我们午餐。过了三天，左尔格要回上海。可是得到消息，当地发生瘟疫，火车客运在潼关断绝。左尔格在西安弄到一架由德国人驾驶的军用飞机，把我们用飞机送往洛阳。到了洛阳，我们分手，他回上海，我乘火车去太原到五台县去看冯玉祥。

我在美国时认识了查良钊。返国后，查良钊与高仁山一起创办了艺文中学。当时，查良钊在冯玉祥那里。我去看查良钊，通过他认识了冯玉祥和李德全。李德全谈话较多。在那里还看到薛笃弼。目的在于了解冯与闫锡山之间的矛盾，住了一个星期就回上海了。

我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时是谁也不知道的，可是中央研究院

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老是不放心我，一直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有一次，他对他的同事们说：“陈翰笙这个人，看样子不像是个共产党员，听说，有一次他从上海到南京，还特地在无锡下车上坟扫墓呢。”但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他终于说服了蔡元培让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上海劳利育路搬到了南京鸡鸣寺。

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 CC 派头头陈立夫就要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团去作一次演讲。这是我到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去看院长蔡元培时，蔡先生告诉我的。我流露出内心的厌恶。他怕我为难，就说道：“好在你可以自己出题目讲，还是去的好。”我想，既然非讲不可，我就选定了“田赋与田租”的讲题。我站在讲台上讲，陈立夫坐在主席位上听。讲完后，他送我出大门，边走边说：不用害怕出什么财政问题。他举起双手作出倾盆大雨的样子，说：“我们可以发行许许多多的法币，毫无问题。”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好笑。我早已深入研究了国民政府财政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从中国银行研究室主任唐有壬和他的助手张肖梅（女）了解到蒋、宋、孔、陈从公债里捞到了大量钱财，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垮台的，我只好一言不发忍笑而去。

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是很头疼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了敷衍他们的面子，在我们所写的《兵差与农民》书名上加上了“中国北部”的字样，其实内容并不限于北部。我们在 1932 年和 1933 年所写的《无锡的土地分配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调查报告，被傅斯年扣下，不但不让发表，连原稿也不知下落。1933 年 6 月 18 日，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暗杀。我在中央研究院孤立无援，而且研究工作已经遇到了障碍，不可能有何发展，因此，我向蔡元培院长提出辞职要求。他很谅解，给了我一个通信研究员的名义，从此，结束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王昆仑策动孙科创办中山文化教育馆做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文化工作。计划没有完全实现，但

他说服了孙科与我接触。我于1933年10月间在南京看了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长孙科和总干事马超骏。他聘请我任该馆特约研究员，我提出了广东农村调查的计划。当年11月底开始用中山文教馆、岭南大学名义在广东进行调查。宋庆龄知道了这件事，就建议我先从中山县开始。她给我介绍信去看中山县模范县长唐绍仪。这个办法果然生效。中山县开了头，其他各县就毫无障碍，并以此为荣。调查时正是陈铭枢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时候。团员中有王寅生、孙勉之（即孙冶方）。薛雨林（即薛暮桥）也曾加以协助。调查报告《广东农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于1934年出版，后来曾有两种日文译本。

广东调查使我对军阀统治的认识和香港与军阀互相勾结的历史知识有所提高，还发现了有关袁世凯的史料。我在沙面遇见一位美国副领事，经过攀谈，才知道他还是我在美国波莫纳（Pomona）大学的先后同学。我问他，能不能让我看看领事馆的档案。他说，可以看，但不许抄写。我发现袁世凯的二三事，给我深刻印象。（1）袁世凯曾派人在广州垄断军火进口。（2）袁世凯有个英国人当他的私人医生，其实是个英国特务。袁世凯也知道，将计就计，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袁世凯通过这位英国医生秘密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Lord Salisbury）献策，要英国出面在天津召开八国联军代表会讨论撤兵办法，同时向西太后推荐袁世凯主持和平会议。这件事说明军阀投靠帝国主义的祸根早就陆续埋下。

1934—1935年

1934年2月，我从广东回到上海，觉得中山文化教育馆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多大希望。我决定从孙科处取得特约研究员的名义，加上我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名义，去日本东京东方文库研究中国经济史。这不过是我的公开职业。去东京前左尔格与我约定，他也去东京，要我专与满铁株式会社里的地下共产党员

来往。离开上海前，我同茶叶专家吴觉农商量，共同组织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我请他在我不在上海的时间，代理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的职务。此会还创办了一个月刊，名叫《中国农村》。

1934年春，我和顾淑型同志在东京租了处小房子住下。我常到东方文库去看书。东方文库的书籍原是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詹姆森的藏书，多半是欧美传教士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著作。原先存放在北京，后来被日本人买去了收藏在东京。我打算利用它来研究中国经济史。那时我国驻东京的留学生监介绍我认识了郭沫若。在东京的交往，最令人难忘的是郭沫若。每次会晤，常常畅谈。记得那年年底，他邀我吃晚饭，畅谈痛饮，我喝醉了躺在榻榻咪上熟睡不醒，他打了电话后，顾淑型来接我回家。有一天我和顾淑型在东京街道上看见了左尔格，可是彼此不打招呼，装着互不相识。我的秘密工作是通过尾崎秀实与满铁的共产党员联系。可是他们有些人是在上海的，因此上海的一些外国朋友是与我联系的。有一次，已经约定1935年3月某日在东京百货商场与上海来的人见面，可是到了那天，不见他来，我不放心，所以回上海来看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从神户乘船到上海找史沫特莱就有分晓。那次，在船上遇见《大公报》经理胡政之，交谈甚洽。在船上看见英文《字林西报》上有消息说有个国籍不明的西人在上海被捕，从他身上搜查出三个护照。我大吃一惊。因此，一步不离胡政之，同他一起上岸，一起进新雅旅馆，一起登记，但没有定房间，马上到霞飞坊去看史沫特莱。她一见到我就大声喊叫“天大的幸运，你来了”。“从这时起，不许你出门”。到了晚上，她送我到路易·艾黎(Rewi Alley)那里，同他工部局的同事英国工程师钱普林(Chamblin)住在一起，那里是有客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艾黎。他早在30年代就同宋庆龄保持密切的关系。由潘汉年领导的地下党电台，就设置在艾黎的寓所里。史沫特莱把我送到那里，可算是最安全的地方了。我在那里大约住了两个

星期。

到上海的第二天，史沫特莱建议把顾淑型接来，由她安排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我因为顾淑型的身体不好，一人行动不便，而且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回来，所以就请王寅生去东京接她来上海。顾回上海后住在工部局一个德国工程师名叫哈姆布尔格(Hamburger)夫妇寓所里。不到十天，史沫特莱就办好了去苏联的手续。艾黎送我到一艘停在海关附近的苏联轮船，同时由哈姆布尔格夫人送顾淑型上船。我们两人被关在船长的厕所里，站了足足两小时，等船开出吴淞口以后，才把我们放出来。到了海参崴，有两位苏联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到莫斯科不久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有两位苏联人陪我们在红场上观礼。1927年，我们两人曾在第三国际农民研究所看到了斯大林夫人阿利卢耶娃，这次，在红场上又看到斯大林本人。观礼完毕，他们送我们回旅馆。

过了几天，忽然有人来带我到一个办公室去谈话。一个穿军装的人和我谈话。他首先问我，当一个共产党员第一责任是什么。我答：服从党的指示。他说，不对，第一是按月交党费。接着他就说：“你是参加过太平洋学会的人。”现在他们的总干事爱德华·卡特(Edward Carter)曾到苏联太平洋学会苏联分会，要分会推荐一位学者去美国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编辑英文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季刊。苏联分会找不出人。但我们知道，去年在加拿大开会时，有个中国学者叫陈翰笙，他可以担任这项工作。”接下去，这位军人说：“本来我们打算派你们两位去美国工作。可是，原先在上海编英文报《中国论坛》(CHINA FORUM)的易乐生(Harold Isaacs)现在回美国去了。这是一个美国托派人物，他认识你。因此，现在你们如果去美国，就只能把你们转到中国党里去了。就这样，我和顾淑型就被送到王明和康生那里去了。那时候，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

1935年11月底，我们夫妇两人去看王明和康生时，他们两人在卧室里谈话，告诉我们，我们两人已经转入中国党内。

1936—1939年

1936年2月间，康生告诉我：“纽约太平洋学会要办《太平洋事务》季刊。季刊总编辑是英国所赏识的美国学者。总干事卡特到几个分会去找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分会都找过了，都找不出人来。想来这是故意要来苏联找人。借此可以拉拢苏联分会。现在我和苏联打算推荐你去。我们打算这么说：“听说你现在在巴黎，所以要卡特到巴黎去找你。你们现在就要准备走，去巴黎。现在卡特在伦敦，5月间回纽约。所以，你们4月初就应当去巴黎。卡特5月初可能到巴黎来看你。”我到巴黎后就写信给卡特告诉他我从中国来到巴黎。我们从莫斯科去巴黎时还带了一个青年去巴黎，因为他不懂外语，没有人带，旅行会发生困难。他就是吴克坚，是去巴黎到《救国时报》社工作的。我们到了巴黎以后，还到瑞士去了一趟。卡特给我来信，要我们马上到英国去与拉铁摩尔见面。4月底我和顾淑型去伦敦。不久，卡特和他的秘书、拉铁摩尔、爱尔塞·丘茉莉和我们夫妇两人一行共六人乘船去纽约。5月25日到达纽约。

我还记得，在我们离开莫斯科之前大约两个星期，康生对我们讲，要我们在美国不要让人家知道是党员。这样才能配合饶漱石的工作。当时饶要到纽约创办《华侨日报》。打算把在法国的《救国时报》停掉，把那里的铅字搬到美国去办《华侨日报》。同时，康生还告诉我，杨度也在上海加入了党，人家都不知道。上海的著名律师章士钊也是我们党的同情者。他还说，在纽约可以同冀朝鼎合作。在离开莫斯科前，有一天潘汉年同志到旅馆来看我们，他说：“以后有什么事要同党联系可以通过宋庆龄，好在你们在上海就已经很熟悉。”那次是我同潘汉年第一次见面，我在上

海和潘梓年同志交谈过几次，所以彼此了解。

我们5月间到纽约。一到纽约，冀朝鼎果然就来看我们。他在纽约办了一个英文月刊。他同纽约太平洋学会的人如卡特等也很熟悉。

我们到纽约不久，遇到了陶行知和跟他一起工作的陆瑾。陶行知是国内群众团体派到美国做民间抗日宣传工作的。陆瑾是他的助手。不久，陆瑾就和饶漱石结婚了。过了半年，铅字才从法国运到纽约，我们就同徐永煊、陈其瑗、唐明照组织《华侨日报》社。从到纽约时起，我就参加了《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我和威廉·霍兰（William Holland）接触较多，同拉铁摩尔接触较少。霍兰是共产党的同情者。每逢苏联外交家和知名学者来纽约，都是卡特、霍兰和我接待。霍兰和丘茉莉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同情苏联。1937年2月，我应加拿大五个太平洋学会分会的邀请到加拿大的中部与西部五个城市作公开演讲，详细解释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同年夏季我被波莫纳大学邀请，在夏令学校里，讲中国政治六个星期。我乘这个机会尽量揭露蒋介石的政治面目。这时候，我和顾淑型两人在纽约参加了救济战时难童募捐委员会。

1939—1942年

1939年5月，我们离开纽约去香港。路过菲律宾在马尼拉呆了一个星期，同菲律宾朋友接了头，5月底到香港，当时宋庆龄和梁淑德曾到码头上来迎接我们。

有一天，廖承志告诉我说，潘汉年要来看我。我对他说，我同他接头好了，不去看潘汉年。我知道廖承志是公开露面的，潘汉年是隐蔽的，我不应当暴露我的党员身份。后来，我跟潘汉年联系都是通过朱伯琛。我在香港露面做了两件事：（1）办了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这是胡愈之到香港同我接头创办，由国新社发行的。每期用航空寄发各国。这个刊物最早把皖南事变（1941.

1.) 报导国外。后来叶挺经过香港去延安，经孙冶方介绍曾来看我，表示感谢。(2) 我帮忙组织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香港主教英人何明华为主席，斯诺和艾黎为委员，我担任执行秘书。两年内收到的捐款约有 1800 万美元，捐款都来自海外，大部分来自北美、西欧和东南亚各地外国人士和华侨。在日军偷袭珍珠港（1941. 12. 8）那天晚上，菲律宾马戏团正在香港演出，义演收入大部分捐献给工业合作社。收到的捐款都分配给抗战后方如江西、福建、安徽、河南、陕北等地工业合作社。我还记得汇给延安的款是李富春同志签名收的。我们的汇款都是经过廖承志姓邓的亲戚通过银行办理的。回想起来我在香港认识了不少人，除国民党人士外，印象较深的是夏衍（沈端先）、范长江、金仲华、张铁生等。

香港沦陷（1941. 12. 18）一个多月后，我和顾淑型乔装店员搭乘难民的轮船，于 1942 年 2 月初离开香港，经过台山、开平、梧州到达桂林。

1942—1946 年

我在桂林同张锡昌和简竹坚一起编《工合月刊》，还帮助顾淑型办了一个妇女工业合作社。就在这时候，重庆工业合作总社派了孟用潜来帮助我们开展工合运动。1942 年底，我为了工合工作到了江西赣县看了工合办事处主任陈志昆，以后，还到了福建漳州。回到桂林以后，应桂林师范学院院长林砺儒的聘请，任该院西文系主任并兼了些课。我刚到桂林不久，从香港来桂林的张友渔同志要给我 100 美元，说是党给我的，我没有收。还有从前在美国认识的上海中国银行研究室的张肖梅（政学系张禹九的夫人）送给我法币 6000 元，我婉言谢绝。我说，我将在桂林师范学院授课，可以不需要钱。我在桂林两年间常到国际俱乐部去看看来往的朋友，其中有李四光、戴爱莲、田汉、萨空了、柳亚子、丁燮林等

人。1942年11月，桂林举行苏联十月革命纪念会，我和杨刚请了英国驻桂林的代理总领事布赖恩（Derer Bryan）在大会上报告英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情况。

那时候，蒋经国在赣县，常从赣县到重庆去看宋美龄，因为他有个姓章的情妇在桂林，所以中途在桂林都要住几天，间或在国际俱乐部里看见他。有一次，看到蒋经国屁股坐在写字台上，两腿挂着，同一个会讲中国话的美国记者谈话。还有一次，看见这位美国记者在浴室里替蒋经国洗脚。

当时，桂林有个英军服务处，头头叫做赖德上校（Connel Recstle Ride）。因为当时有数百名英军困在汕头，这个机关是为英军服务的。因丘茉莉的介绍我认识了赖德。赖德要找一個懂口文的中国人去帮忙，我就介绍了孙亚明（中共党员）。我还认识美国驻桂林的副领事，是个自由主义的记者，叫做查尔斯·塞维斯（Charles Service），他也是我们母校波莫纳大学毕业的。他要找一个中文秘书。我介绍了杨承芳（中共党员）。那时，我和党的联系是通过李亚群。他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战委员会书记。我和李亚群来往是不让人知道的，谈话都在野外树林里。解放后，1952年我在北京还同他见过面。那时，我的外甥女孙少礼在桂林美国新闻处工作，由于她的关系，我认识了美国新闻处处长史密斯。

有一天陈此生来看我，要我第二天到他那里去吃早饭，说有事要和我谈谈。我到他那里以后，还没有吃早饭，他就拉我走出房间，在室外空地上，坐在拆掉了房屋的石基上。他低声对我说，重庆军事委员会有密电给桂林军委会办公厅，要逮捕一批人，名单里有我。他劝我赶快离开桂林，最好出国到美国去。我回去就和顾淑型商量。第二天，我和顾淑型就到全州暂避。同时，托顾淑型的姐夫孙树珊设法帮我们办去印度的护照。当时孙树珊在重庆当交通部参事。护照上用的都是假名。还在桂林托人找了一家商行作领出国护照的保证人。在张锡昌那里工作的简竹坚（现在在香港任南洋烟草公司董事）给了我600美元，作我们去印度的旅

费，护照办好，我们从全州回桂林。英军服务处的赖德上校帮我们同印度新德里英国新闻部远东局联系好，让我们两人在那里工作。经过桂林英军服务处和桂林美国新闻处的帮助，我和顾淑型乘上英国人驾驶的汽车到达昆明。第二天早晨，我和顾淑型看了早年的同盟会会员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他那里吃了早饭，就乘人力车去机场。英国驻昆明领事馆为我们安排一架小军用飞机，飞往印度加尔各达。下了飞机，在通往市区的路上，顾淑型听见中国人群中有人说中国话：“他妈的，到这儿来了。”当时驻在加尔各达的中国机关很多，重庆派来的特务也很多。我在加尔各达不到一个星期就去新德里工作。在新德里不久就认识了德里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来希（Curashi）教授（后任巴基斯坦教育部长）。他邀请我在德里大学历史系任入学考试评卷员。我还加入了印度的历史学会，两次出席他们的年会，因此，有机会游历了许多地方。我在新德里认识了印度历史家潘尼迦，常常接触。后来，他当了印度第一任驻华大使。1945年9月和11月，我在印度农村作了些调查访问，认识了一些印共学者，如南方的南布迪里巴德（E. M. S. Nam-beediripad），孟加拉的安必加·高士（Alnbia Ghosh）和戈帕尔·哈达（Gopal Haldar）。他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有一部分我把它列入我所写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48年英文本）的注释里。在新德里，我常遇到一些过路的新闻记者，如杰克·塞维斯（Jack Service）就是其中之一。康生那时在延安，曾经两次通过美国记者给我带党内文件。那时，我与康生还有点来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一年，前桂林英军服务处处长赖德上校将去澳大利亚任墨尔本大学校长。他邀请我去当教授。可是，正在这时候，1946年秋天，英国记者彼得·汤森（Peter Thownsend）从北京带给我由周恩来和廖承志两同志署名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我直接去美国，不必回国。所以，我就婉言谢绝了赖德的邀请。

1946—1950 年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美国，这次在那里呆了 4 年。在这 4 年间，我曾在美国中部调查了美共在农村的影响。通过詹姆斯·艾伦（James Allen）了解美共的内部问题。我曾同唐明照、徐永焜、徐鸣等一起参加留美党员座谈会；同浦寿昌、俞沛文、浦山等一起参加中国留学生的夏令营；我还参加薛葆鼎主持的“建社”座谈会。那时，我还和脱离了美共的党员，如苏开明等人取得联系，我每周写信到香港与乔冠华联系。

我到美国后，先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特聘教授，讲中国历史半年。后应拉铁摩尔的邀请，在霍普金斯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参加新疆史地研究工作。后来出版了《亚洲腹地边疆》这部集体著作，结束了那项研究。一年以后，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印度历史研究员约两年。以后，应纽约亚洲研究所聘请，担任教授，每周讲课一次。

由于从前认识的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友人介绍，我认识了詹姆斯·艾伦，通过和弗雷德里克·菲尔德（Frederick Field）认识了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同福斯特见过几次面。

冯玉祥和李德全从旧金山到华盛顿去看前驻华武官马歇尔时，在他和拉铁摩尔会面的场合，我和冯玉祥、李德全来往过几次。我们还谈到他们当年被困在山西的情景。据后来杨刚告诉我，当时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认为我们不应当让冯玉祥去看马歇尔。章汉夫以为冯玉祥之所以到华盛顿去看马歇尔是由于我们没有阻止他。我问杨刚，冯与马歇尔是老朋友，为何不能去看，看了有什么不好。章汉夫怀疑冯玉祥想取得马歇尔的帮助，东山再起，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1950 年在纽约时，我常同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卜卜维奇（Popovitch）讨论国际问题。他认为苏联在与南斯拉夫贸易协定上

的货物价格是不公平的。到了 1951 年，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馆第一任代办。

1950 年春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来了两个人问我何时回国。我答：我与纽约亚洲研究所有合同，明年合同期满才回国。他还问我，听说冀朝鼎被派到旧金山中国银行当行长，有没有这事。还问我同史沫特莱有没有来往。我说，在上海见过史沫特莱，以后没有见到过。事实是：徐鸣从纽约回过北京一趟，返美后带给史沫特莱 2000 美元给她作来中国的路费，这笔钱是我亲手交给她的。

1950 年 10 月我和顾淑型从纽约乘船到英国。签证是由南斯拉夫的卜卜维奇帮忙办理的。到了英国，我去剑桥大学看了拉铁摩尔等人。一周后，乘飞机到捷克，在那里见到了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伍修权、龚普生、乔冠华、浦山等同志。他们启程后，我们就转入波兰。在波兰呆了一个月，等候苏联的签证。取得签证后，我和顾淑型经过苏联回国。到达北京的时刻是 1951 年 1 月 31 日晚间。从此就结束了我 25 年的地下工作。

《地下工作二十五年》读后感(一)

薛葆鼎

陈翰笙同志平铺直叙地口述了他《地下工作二十五年》经过，也就是说他谨记李大钊同志的亲口嘱咐，开始以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作学术活动而担任共产国际的秘密情报工作，以后又为我党工作，至今已过 60 年了。

他 1915 年去美国求学是从园艺学转地质学开始的，当时他是受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震撼，使他攻读历史学，并运用英文、德文、俄文等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工具。

有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之后，他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1924—1925 年同苏联朋友们的来往中，从《资本论》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思想转变后，在李大钊同志介绍下，为共产国际做秘密情报工作。后来到 1935 年，在莫斯科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在思想转变后，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亲自领导，并受了蔡和森同志长夜密谈的影响，他就开始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逐渐同蔡元培、陈友仁、宋庆龄、邓演达、杨杏佛、冯玉祥、王昆仑等，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还同国民党的《现代评论》派、改组派等也保持一定的关系，为他后来的工作开展（如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和为史沫特莱提供中国国内材料等）都起了很大作用。